



德州学院
DEZHOU UNIVERSITY

高教 发展 资讯



2026年第2期（总第38期）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发展规划处 编印
2026年4月29日



高教发展资讯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2026 年第 2 期（总第 38 期）

主办：发展规划处

本 期 目 录

1. 分类改革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现实困境 1
2. 分类推进视域下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实施路径 9
3. 建强应用型大学需要教育范式创新 19
4.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的建议 24
5. 应用型本科高校：过去十年发展简述及未来十年发展策略 32
6.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创新 42
7.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52
8. 应用型高校要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64



分类改革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现实困境

山西工商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鸿波

近期，山西工商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兼任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副秘书长刘鸿波，立足高校分类改革总体框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特征，系统阐释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功能坐标与核心内涵，全面剖析当前应用型大学建设面临的定位模糊、内涵薄弱、产教脱节、评价错位等现实困境，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可推广性的实施路径。本文对文章的“分类改革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现实困境”部分进行摘编——

文章提到，尽管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已成为国家战略部署，应用型高校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在分类改革背景下，我国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办学理念、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

（一）定位认知模糊，分类发展定力不足

定位模糊、认知偏差是当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面临的首要困境。部分高校对应用型大学的核心内涵理解片面，将“应用型”等同于“低层次、低水平”，认为应用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补充”，缺乏对应用型办学定位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这种认知偏差导致部分应用型高校仍以研究型大学为标杆，在学科建设、师资评价、科研导向等方面盲目模仿，陷入“重学理、轻应用，重论文、轻转化，重规模、轻特



色”的误区。

具体来看，一是学科专业设置趋同，部分应用型高校不顾区域产业需求，盲目增设热门学科专业，追求学科门类的全面性，导致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二是人才培养模式同质化，仍沿用传统的理论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忽视实践教学，实践环节流于形式，难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是科研导向偏差，部分高校将学术论文、科研项目作为科研工作的核心目标，忽视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应用型办学定位相悖。

此外，部分地方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向研究型大学倾斜，对应用型大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加剧了应用型高校分类发展定力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应用型高校难以坚守自身定位，盲目追求层次提升，偏离了特色化、

应用型发展道路。

（二）办学能力薄弱，内涵建设存在明显短板

内涵建设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核心，但当前我国部分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薄弱，内涵建设存在诸多短板，难以满足“双优”工程提出的“办学能力优质”的目标要求。

1. 学科专业建设质量不高，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足。学科专业是应用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但部分应用型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存在“大而全、杂而乱”的问题：一是传统专业改造升级滞后，部分传统专业未能及时对接产业升级需求，课程体系陈旧，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二是新兴专业建设缺乏支撑，部分高校盲目增设新兴专业，但缺乏相应的师资、设备、实训基地等支撑条件，办学质量难以保证；三是专业集群建设不足，未能围绕区域主导产



业打造特色专业群，专业之间缺乏协同性，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据统计，当前我国部分应用型高校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需求的适配度不足 60%，难以有效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2. 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育人成效不佳。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但部分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实践教学比重不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失衡，实践教学课时占比低于 30%，难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二是实训基地建设滞后，校内实训基地设备陈旧、数量不足，校外实训基地多为“挂牌式”合作，缺乏深度合作，难以提供真实的生产实践场景；三是实践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实践教学仍以基础技能训练为主，缺乏对企业真实项目的融入，难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四是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

部分教师缺乏行业实践经历，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滞后，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师是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的核心力量，但当前我国应用型高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面临诸多困境：一是“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部分应用型高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低于 40%，远低于“双优”工程提出的要求；二是“双师型”教师结构不合理，中年教师占比过高，青年“双师型”教师储备不足，教师行业实践经历、技术研发能力薄弱；三是“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不完善，缺乏系统的行业培训、挂职锻炼机会，教师难以更新知识结构、提升实践能力；四是“双师型”教师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仍偏重学术论文、科研项目，忽视教师的行业实践、技术转化、教学改革等



成果，难以激发教师投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研究的积极性。

4. 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但当前部分应用型高校治理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治理结构不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专家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未能有效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不畅；二是内部管理体制僵化，部门设置不合理，管理效率不高，难以适应应用型办学的需求；三是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在学科专业设置、人事管理、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受到较多限制，缺乏自主改革的空间和动力；四是治理能力不足，学校管理层缺乏应用型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难以有效推动学校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

(三) 产教融合不深，协同育人机制不畅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核心办学模式，也是实现“服务区域优秀”的关键路径，但当前我国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仍处于浅层阶段，协同育人机制不畅，难以实现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协同发展。

1. 校企合作层次偏低，实体化合作不足。当前，多数应用型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仍停留在协议签订、实习安排、订单培养等浅层阶段，缺乏共建产业学院、共研技术项目、共享师资平台、共设人才培养方案等实体化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多将校企合作视为“履行社会责任”，缺乏主动参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的动力，导致校企合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例如，部分企业虽然与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并未真正参与课程开发、教学实施、质量评价等环节，实习安排也多为“参观式”“体验式”，难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2. 政校企行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难度大。产教融合需要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协同发力，但当前政校企行协同机制存在诸多短板：一是政府统筹协调力度不足，缺乏统一的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配合，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二是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未能有效对接高校与企业的需求，推动双方深度合作；三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缺乏利益共享机制，高校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未能有效对接，双方合作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四是资源整合难度大，高校的师资、科研资源与企业的生产、技术资源难以有效共享，导致资源浪费。

3. 产教融合政策保障不足，激励机制缺失。当前，我国关于产教融合的政策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一是对企业参与产教融合

的激励政策不足，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税收优惠、经费补贴等政策未能有效落实，难以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二是产教融合经费投入不足，政府对产教融合的专项经费投入有限，高校和企业的投入能力也不足，导致产教融合项目难以持续推进；三是产教融合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对高校、企业产教融合成效的科学评价，难以有效引导双方深化合作。

(四) 评价体系错位，分类考核导向缺失

评价体系是引导高校发展的“指挥棒”，当前我国高校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分类考核导向缺失，难以适应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需求。

1. 评价标准同质化，忽视应用型特色。当前，我国高校评估、学科评估、职称评审等评价体系仍以研究型大学为标杆，偏重学术论文、科研项目、学位点数量、



科研经费等数量指标，忽视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成效。例如，职称评审中，论文、项目仍是核心评价指标，教师的行业实践、技术转化、教学改革、学生培养等成果难以得到充分认可；学科评估中，偏重学科的学术水平，忽视学科的应用能力和社会服务贡献，导致应用型高校为获取资源被迫迎合学术导向，偏离应用型办学初心。

2. 评价主体单一，缺乏多元参与。当前高校评价主要以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为主，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评价的渠道不畅，评价结果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应用型高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服务成效。例如，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贡献等，行业企业最有发言权，但行业企业未能有效参与评价过程，导致评价结果缺乏针对性和客观性。

3. 评价结果运用不足，激励

约束作用不明显。当前，高校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绩效考核等的关联度不高，评价结果的激励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例如，部分应用型高校虽然在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评价体系的错位，难以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而部分高校通过盲目追求论文、项目等数量指标，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支持，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发展的困境。

（五）政策保障不足，资源支撑体系滞后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需要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充足的资源支撑，但当前我国针对应用型大学的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资源支撑滞后，难以满足“双优”工程的建设要求。

1. 专项政策供给不足，针对性不强。当前，我国关于高校分类改革、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政策多为宏观指导，缺乏针对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的专项政策和具体实施细则。例如，在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权、招生计划、人事管理等方面，缺乏针对应用型大学的差异化政策，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大学执行相同的政策标准，难以体现其办学特色和发展需求；在产教融合、技术转化等方面，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具体的激励措施和保障机制。

2. 经费投入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政府经费投入主要向研究型大学、“双一流”高校倾斜，应用型高校的经费投入不足。2023 年，我国普通、职业高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 1.86 万元，其中应用型高校生均仪器设备值远低于研究型大学，部分应用型高校经费缺口较大，难以支撑学科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内涵建设任务；同时，社会力量参与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渠

道不畅，多元投入机制尚未形成，高校自筹经费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经费短缺的问题。

3. 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当前，我国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导致师资、科研设备、实训基地等资源浪费严重。例如，部分应用型高校的实训基地利用率不高，而部分企业的生产设备闲置，双方未能实现资源共享；高校之间的师资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等机制未能有效落实，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4. 区域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应用型高校发展滞后。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应用型高校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厚，政府对应用型高校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力度较大，应



用型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紧密，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产业基础薄弱，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高，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条件较差、内涵建设不足，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难以满足区域产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 3 月 24 日

麦可思研究）



分类推进视域下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实施路径

山西工商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鸿波

近期，山西工商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兼任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副秘书长刘鸿波，立足高校分类改革总体框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特征，系统阐释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功能坐标与核心内涵，全面剖析当前应用型大学建设面临的定位模糊、内涵薄弱、产教脱节、评价错位等现实困境，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可推广性的实施路径。

3月24日，麦可思研究已刊发“分类改革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现实困境”。本文将聚焦“分类推进视域下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实施路径”。内容摘编如下——

针对当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分类

推进高校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双优”工程的目标任务，坚持“分类定位为前提、内涵提质为核心、产教融合为路径、分类评价为保障、政策支持为支撑”的总体思路，从五个维度提出实施路径，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确保“双优”工程落地见效。

（一）校准分类定位，明确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发展航向

科学精准的定位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前提，只有校准分类定位，明确发展方向，才能避免同质化发展，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道路。

1. 强化顶层设计，明晰分类标准。国家层面出台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专项指导意见，明确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核心内涵、办学定位、设置标准和建设规范，



将应用研究、技术转化、区域服务、实践育人作为核心认定指标，与研究型大学、职业技能型院校形成清晰的边界，避免“泛应用型化”。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定本地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引导应用型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办法及实施细则，为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可结合“双优”工程要求，进一步完善应用型大学分类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

2. 立足区域禀赋，找准特色发展赛道。应用型高校要结合地方产业规划、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坚持“错位发展、特色办学”，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和特色赛道。一是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群，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

精准对接，形成“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例如，新能源产业发达的地区，应用型高校可重点打造新能源专业群，聚焦新能源技术应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培养相关应用型人才；二是结合地方文化特色、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学科，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例如，农业发达的地区，应用型高校可重点打造现代农业专业群，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三是明确服务面向，聚焦地方中小企业、新兴产业企业的需求，提供精准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贴身智囊”。

3. 坚守应用型初心，增强分类发展定力。应用型高校要摒弃“攀高、求全、趋同”的思维，坚定应用型办学初心，增强分类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是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明确应用型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推动技术转化、服务区域发展，不盲目追求学科门类扩张、



学位点升级；二是强化特色意识，聚焦自身优势学科和专业，集中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避免同质化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师生、社会对应用型大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破除“应用型=低层次”的片面认知，营造重视应用型大学建设、支持应用型大学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聚焦内涵提质，提升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能力

内涵建设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核心，要以“办学能力优质”为目标，聚焦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创新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办学能力和办学质量。

1.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学科专业建设质量。学科专业建设是内涵建设的核心，要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一是开展区域产业需求调研，每年对接区域产

业急需清单，增设新兴专业、升级传统专业、淘汰落后专业；例如，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增设相关专业，培养紧缺应用型人才；针对传统制造业升级需求，升级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专业，融入新技术、新方法；二是推进专业集群建设，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整合相关学科专业资源，打造特色专业群，提升专业群的协同性和竞争力；三是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将企业技术标准、真实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四是推进专业认证，积极参与应用型专业认证，以认证促建设、促质量，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成效。人才培养是应用型大学的核心任务，要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实践育人改革。一是构建“基础实践+专业实训+



顶岗实习+创新创业”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确保实践教学课时占比不低于 40%；二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基地要配备先进的实训设备，模拟企业生产场景；校外实训基地要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真实的生产实践场景；三是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产业导师工作站，推行“双导师制”，由高校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共同指导学生学习和实践；四是强化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开设创新创业课程，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五是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引入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价，以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3. 建强“双师型”师资队伍，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双师型”师资队伍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的核心力量，要完善教师引育用评机制，全面提升“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一是扩大“双师型”教师规模，制定“双师型”教师引育计划，引进行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和企业高管担任兼职教师，同时支持校内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技术攻关，提升行业实践能力；二是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与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开展系统的行业培训、技能认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和教学改革研讨，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三是优化“双师型”教师结构，加大青年“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形成合理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专业结构；四是健全“双师型”教师评价激励机制，设立“应用推广型”职称序列，将技术转化、产品研发、标准制定、决策咨询、教学



改革、学生培养等作为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提高“双师型”教师的待遇，激发教师投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研究的积极性。

4. 提升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能力，强化科研创新支撑。应用型高校的科研工作要以应用研究为核心，聚焦区域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难题，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一是建立有组织的应用研究机制，围绕区域产业需求，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针对性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攻关；二是加强应用型科研平台建设，建设区域技术转移中心、中试基地、重点实验室等，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三是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明确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比例，鼓励教师开展成果转化，推动专利、技术、方案等就地转化，提升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四是加强与科研院所、

企业的科研合作，共建科研平台、共研技术项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的协同性和实效性。

5.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落实办学自主权。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要构建与应用型办学相适应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和管理效率。一是完善治理结构，落实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吸纳行业企业专家、校友代表参与学校治理，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二是深化内部管理改革，优化部门设置，明确部门职责，提高管理效率；三是落实办学自主权，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在学科专业设置、人事管理、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支持，扩大学校自主改革的空间和动力；四是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学校管理层的培训，提升其应用型办学理念和管理能力，推动学校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



(三) 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发展生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核心办学模式，要以“服务区域优秀”为目标，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政校企行协同育人发展生态，实现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协同发展。

1. 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实体化合作落地。应用型高校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化校企合作，推动校企合作从浅层向深层、从形式向实体转变。一是共建产业学院，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组建师资队伍，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衔接；二是共研技术项目，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三是共享师资平台，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企业技术骨干到高校担任兼职教师，实现师资互聘、

优势互补；四是共设人才培养项目，推行订单培养、定向就业、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式，定向培养企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

2. 健全政校企行协同机制，提升协同发力效能。加强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的协同配合，构建“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参与、行业协调”的协同育人机制。一是强化政府统筹协调，政府部门要出台专项政策，加强对产教融合的引导和支持，统筹资源配置，推动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行业协会要对接高校与企业的需求，制定行业人才培养标准，推动双方深度合作；三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明确高校、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权利和义务，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激发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四是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建立政校企行协同育人联盟、产业创新联盟等，推动资源



整合和信息共享，提升协同育人效能。

3. 完善产教融合政策保障，强化激励约束。政府部门要完善产教融合政策保障体系，强化激励约束，激发高校和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一是加大对产教融合的经费投入，设立产教融合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产业学院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技术研发等项目；二是落实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税收优惠、经费补贴等政策，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加大对产教融合的投入；三是建立产教融合评价机制，将产教融合成效作为高校评价、企业评价的重要内容，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对产教融合成效显著的高校和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对未履行产教融合责任的高校和企业进行约束。

（四）创新分类评价，发挥评价指挥棒导向作用

评价体系是引导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指挥棒”，要创新分类评价体系，建立符合应用型高校特点的评价标准，发挥评价的诊断、激励和导向作用，推动应用型高校聚焦内涵建设、特色发展。

1. 构建应用型特色评价体系，突出核心评价指标。坚持以质量、贡献、特色为核心，构建符合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特点的评价体系，淡化论文、项目、学位点等数量指标，强化以下核心指标：一是人才培养质量，重点评价毕业生就业适配度、职业发展、企业满意度、创新创业能力等；二是产教融合成效，重点评价校企合作深度、实践教学占比、产业学院建设水平、技术转化产值等；三是社会服务贡献，重点评价技术转化产值、决策咨询采纳情况、区域产业支撑度、乡村振兴服务成效等；四是内涵发展水平，重点评价专业特色、师资结构、教



学改革、治理能力等；五是创新能力，重点评价应用研究成果、技术攻关能力、专利转化情况等。

2. 实施分赛道分类评价，避免同质化竞争。在高校评估、学科评估、职称评审、经费分配、项目申报等方面，对应用型大学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划线，避免与研究型大学同质化竞争。一是在学科评估中，针对应用型学科制定专门的评价标准，重点评价学科的应用性、实践性和社会服务贡献，而非学术水平；二是在职称评审中，设立“应用推广型”职称序列，明确评价标准，突出教师的行业实践、技术转化、教学改革等成果；三是在经费分配、项目申报中，对应用型高校给予倾斜，设立应用型专项项目，支持应用型高校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

3. 完善多元评价主体，提升评价科学性和公信力。打破单一的政府评价模式，引入行业企业、

第三方机构、社会公众、校友等多元主体参与评价，形成多元评价体系。一是邀请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质量、产教融合成效等方面的评价，充分发挥企业的话语权；二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三是畅通社会公众、校友参与评价的渠道，通过问卷调查、满意度测评等方式，收集社会公众和校友的意见建议，全面评价应用型高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

4.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奖优罚劣、动态调整，引导应用型高校把精力集中到内涵提质、特色发展、服务贡献上来。一是对评价优秀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和资源倾斜，优先支持其开展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产教融合等



工作；二是对评价不合格的应用型高校，进行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限制招生、暂停招生，直至撤销办学资格；三是将评价结果作为高校管理层绩效考核、教师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激发高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完善保障体系，夯实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可持续发展根基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支撑，要强化政策保障、经费保障、资源保障和区域协同，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强化政策制度保障，完善差异化政策供给。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出台针对性的专项政策，完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政策保障体系。一是出台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专项指导意见，明确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在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权、招

生计划、人事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二是完善产教融合、技术转化、“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政策，细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三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扩大应用型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人事管理、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权，支持其自主改革、特色发展；四是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引导高校、企业、社会公众准确理解政策，营造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良好氛围。

2. 加大经费资源投入，构建多元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财政投入、社会投入、学校自筹相结合的多元经费保障机制，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设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专业集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引育、应用研究等工作，逐步提高应用型高校的经费投入比重；二是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办学，鼓励企业、行业协会、校友等捐资办学、共建项目，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三是提升高校自筹经费能力，鼓励高校开展技术转化、社会服务等活动，增加自筹经费收入；四是优化经费使用效益，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考核机制，确保经费专款专用、高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

3. 健全资源共享机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建立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师资、科研设备、实训基地、课程资源等，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是推进区域高校协同发展，建立区域应用型高校联盟，实现师资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平台共用，提升区域应用型高校的整体水平；三是深化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资源共享，推动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资源与高校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有效对

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4.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的支持力度，推动区域应用型高校协同发展，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差距。一是国家层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内涵建设；二是推动东部地区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与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结对帮扶，开展师资培训、学科共建、科研合作等，提升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水平；三是结合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引导中西部地区应用型高校找准特色定位，打造特色专业群，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 3 月 26 日
麦可思研究)



建强应用型大学需要教育范式创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赵军

教育范式创新的深层意涵，在于推动办学逻辑从传统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牵引”，即从以学科自身演化为出发点的知识生产，转向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的价值创造。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部同步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引导应用型高校从“学科自身逻辑”转向“产业需求牵引”，从“学术指标追赶”转向“服务贡献导向”。面对科技产业变革的倒逼，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亟需以教育范式创新破解发展瓶颈，实现从“指标追赶”向“特色引领”的转型。

“双优”工程：分类发展的政策牵引

“双优”工程，即“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优秀”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工程。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出迫切需求，而部分应用型高校长期存在办学定位模糊、与产业脱节等问题，既制约自身发展，也难以有效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建设。

“双优”工程突破了传统高校建设的评价框架，将办学质量与区域服务能力深度耦合，为应用型高校明确了发展坐标。其核心意涵在于推动应用型高校实现从“学科导向”向“需求导向”的根本转变，使办学逻辑由“办什么学”转向“为谁办学”。该工程与“双一流”“新双高”建设形成功能互补，共同构建起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分类发展、各展所长的生态体系。然而，在“双优”工程落地实施过程中，应用型高校仍面临诸多深



层发展掣肘。

结构性约束：学科逻辑的

路径依赖

我国 1300 多所本科高校中，研究型大学以知识创新为使命，技能型高校以技术技能培养为核心，定位较为明晰。而数量占优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在转型中仍面临共性挑战：部分院校仍沿袭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以拓展学位点、引进高层次师资、追求高被引论文等方式提升可见度。这种局部化发展模式虽短期内提升可见度，却陷入芝诺悖论所揭示的“追赶而永难超越”的困境，未能触及应用型高校分类发展与系统性重构的内在要求。其深层原因在于办学逻辑的错位——应用型高校沿用研究型大学的学科逻辑，未能建立起与产业逻辑相匹配的组织架构与评价体系。这一错位体现为三重结构性约束：

其一，学科组织协同壁垒。

传统学科规训衍生的院系架构，

形成无形学术疆界，跨学科协同受制于组织壁垒与资源分配机制。新兴交叉领域难以获得制度合法性，知识模块被固化于传统学科归属之中，阻碍了复合型知识网络的构建。在传统“校-院-系”管理结构下，师资编制、经费分配与绩效考核高度依附于单一院系，跨学科合作需要承担较高的制度成本，这使得面向产业真实问题的跨领域协同难以有效开展。

其二，产教融合周期错位。

近年来，专业设置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人才需求持续增长，而传统专业调整机制响应迟缓，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知识供给的静态性与产业需求的动态性形成错配，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能力需求脱嵌，毕业生能力结构与岗位要求之间存在适配时差。

其三，能力培养范式冲突。

当前课程体系仍受科学教育范式



主导，实践教学空间明显不足。工程伦理、系统思维、项目管理等隐性知识难以纳入理性主义课程框架，人才能力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产生错位。学生在校期间缺乏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系统训练，进入职场后难以快速胜任岗位要求。

上述困境折射出应用型高校转型中的深层矛盾：一方面需精准响应区域产业升级诉求，另一方面仍受传统学科逻辑的惯性牵引。

从学科逻辑到产业与创新逻辑的 五大着力点

应用型高校发展要实现从学科逻辑向产业与创新逻辑的转换，关键在于知识生产、专业设置、组织关系、人才培养、价值评价等关键环节的系统性突破。基于国内外应用型高校的改革实践，可将教育范式创新归纳为五个着力点：

第一，重构跨学科知识生产

模式，破解学科制度性障碍。学科壁垒导致“知识割裂”，破解的关键在于推动知识组织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建立围绕现实问题灵活组建的跨学科学习研究单元。近年来，部分先行院校开始探索院系组织重构，将工科学院按产业链逻辑重组为技术学部，使组织架构直接对标产业需求。国际上，美国欧林工学院取消院系建制，贯通工程学、数学、科学、设计等四大课程模块，支持学生自主设计复合型学习方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则以“反学科”为理念，设立多个跨学科研究小组，推动知识融合。需要强调的是，学科交叉并非盲目求广，而应遵循“技术关联性与知识互补性”的基准原则。

第二，建立知识更新动态响应机制，消解产教融合时滞效应。当前，第四次技术革命持续催生新产业领域与新工作模式，教育供给静态化与产业需求迭代的矛



盾日益突出。上海部分高校以“重服务、强贡献”计划为牵引，围绕重点领域建立产业需求跟踪机制，形成“产业需求-岗位能力-学生发展”三端联动的专业调整机制。在此过程中，微专业为产业前沿知识快速进课堂提供了灵活载体。这些探索表明，知识的动态调整不能止于被动填补滞后缺口，其深层逻辑在于系统构建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机制。

第三，创新校企制度性绑定模式，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针对专业设置周期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校企合作浮于表面等问题，可通过强化权责互嵌制度设计实现深度协同，建立实质性的权责关系，而非停留于协议签署层面。部分具有行业背景的院校与企业共建产业研究院，在校内建设中试线，设立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企业负责人担任理事长，校企双方建立“双向派驻”

机制，形成组织层面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深度绑定，还需进一步探索实体化平台支撑机制，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实体化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与技术转移中心，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科研课题与教学内容，切实提升高校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整体能级。

第四，推行全学程进阶式项目学习，重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范式。传统课程体系过于侧重理论传授，挤占了实践空间。关键在于突破学科本位课程框架的束缚，系统融入项目式学习(PBL)，构建贯穿四年的进阶式产教融合育人体系，学生从大一通过认知实习深入产业一线，到大二通过跨专业协作提升协同实践能力，大三通过综合性项目强化系统思维，直至大四依托企业真实课题完成从概念到交付的全流程训练。这种“实践反哺理论”的培养路径，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习得隐性知识，其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第五，培育创新文化生态，重塑应用型高校价值导向。突破学术评价导向偏离真实问题解决的困境，需优化办学成效评价体系，提升产业合作、技术转化、社会服务等指标权重。在实践中，应进一步强化教师评价中的实践导向，重点突出实践能力、实践业绩和实践教学水平等维度的考核，适度降低传统学术型指标的权重，对教师指导学生企业践习、专利开发项目、工程开发项目等应用型成果给予更多认可。底层逻辑是，应用型高校应将师生的价值导向从追求论文发表转向解决真实问题，即以创新贡献度重构其价值导向。

综而述之，应用型高校应把握“双优”工程建设的历史机遇，以深层次的教育范式创新破解其发展瓶颈。这一创新的深层意涵，在于推动办学逻辑从传统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牵引”，即

从以学科自身演化为出发点的知识生产，转向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的价值创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发展向度下校企协同创新组织样态演化与制度重构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2026 年 4 月 14 日
《文汇报》)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的建议

李佐军 张亮 王伟进 王炳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不仅要培养研究型人才,也要树立应用型办学理念,培养青年一代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战略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各类高校发展定位不清晰、热衷于办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缺乏特色等问题,建议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新阶段,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

一、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

校,是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满足应用型人才增加需求的普遍做法。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对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技术人才等应用型人才需求增加,需要建设更多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来培养。

1978年以后,美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为了满足应用型人才增加需求,大力发展社区学院等应用型高校,增设计算机科学等应用型专业。据卡耐基高等教育分类系统统计数据,2000年、2020年,美国应用型高校数量已分别达到研究型高校的3倍和4倍。1976年,德国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79年)前夕,颁布《高等学校总纲法》,明确应用技术大学的法定地位,加快发展应用型高校。德国联邦教育科研



部数据显示,1993—2012 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从 125 所增加到 214 所,远高于其他类型高校增幅。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 万美元,应用型人才需求日趋增加,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建设应用型高校来满足。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校分类发展的客观要求。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高等教育阶段理论指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学生群体的差异性增加,高校需要更多分类发展。美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于 198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进入普及化阶段,开始加快发展各类应用型高校。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进入普及化阶段,对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提出了迫切要求。但目前我国各类高校定位不清、同质发展、应用型高校缺乏特色,这

一现状亟须改变。因此,《纲要》部署,我国未来高校将分三类发展:研究型高校侧重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多为“双一流”高校;应用型高校侧重培养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技术人才等应用型人才,如各种理工、科技、医药、财经、师范等院校,多为地方“双非”(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本科高校;技能型高校侧重培养具有操作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主要指高职(大专)、职业本科高校。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困境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不少人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据智联招聘《2024 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55.5%,其中普通本科院校硕博就业率仅 33%,同比下降 17%。另一方面,不少



用人单位存在“招工难”问题，其中技术应用岗位尤为严重。人社部《2023 年紧缺职业报告》显示，智能制造、新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岗位缺口超过 2000 万。造成这种“两难”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应用型高校发展不足。调研发现，应用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适应能力普遍高于研究型高校。江苏省教育厅数据显示，2021 年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96.2%，对口就业率（毕业生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达到 85%，显著高于其他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约 60% 的企业认为应用型高校毕业生“上手快、适应能力强”，而传统高校毕业生的这一比例仅为 35%。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近年来纷纷将过半的校招名额定向投放到应用型高校。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继续增

长阶段减轻财政教育支出压力的有效途径。课题组根据七普数据预测，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 2032 年前将继续增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24 年的研究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 2023 年的 60% 持续增长至 2035 年的 75%。可见，未来这段时期投入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很大。国内外经验表明，研究型高校投入成本明显高于应用型高校。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2 年研究型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约为 6.8 万元/年，而应用型高校为 4.2 万元/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生均成本仅为综合性大学的 70%，但其毕业生就业率（95%）却显著高于综合性大学（88%）。同时，应用型高校更易对接市场、利用社会投资，可通过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推进技术应用转化、获得捐赠等方式，让企业分担更多成本。如浙江万里学院与吉利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



专业，吉利承担了 60% 的实训设备费用，学校财政压力减轻 40%；常州工学院与中车集团合作研发“高铁轴承智能检测系统”，专利转化收益超 2 亿元，其中 30% 用于反哺学校。因此，建设更多的应用型高校可以缓解财政压力。

二、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具备较好基础和条件

中央和地方已明确加快建设的基本方向。2015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高校要“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同时，各地出台了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相关政策。如浙江省 2015 年出台了《关于积极促进更多本科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强化

学校特色发展为重点”，“大力培育特色优势，重点建设一批地方和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专业”；2016 年进一步发布了《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分类评价管理办法》及分类评价指标体系。2024 年，黑龙江省等开展了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评估，推动专业更加适配区域发展需要，形成优势特色应用专业集群。

应用型高校建设已有一定基础。目前，我国已建成数量不少、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2022 年，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纳入监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达 633 所。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为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实施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项目院校 100 所）和“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储备



校”137所),去除重复后共确定了200所重点建设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四川等地积极建设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特色学院,为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提供了重要载体。各地还涌现了浙江科技大学、闽江学院(现为闽江大学)等一批应用型本科示范学校。以闽江学院为例,该校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服务产业的特色专业,积累了围绕地区产业链开设专业和设计课程、通过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促进产教融合等经验。

许多“双非”高校和地方本科高校可改造为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共有高校3117所,其中普通高校2868所(普通本科高校1257所、职业本科高校51所、高职专科院校1560所),成人高校249所。根据2024年《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所有普通本科高校中确定了147所“双一流”高校,“双非”高校占普通本科高校的89%。同时,教育部数据显示,在所有普通本科高校中有1143所地方本科高校,占普通本科高校的91%。可见,“双非”高校和地方本科高校都占普通本科高校的大头。这些高校普遍缺乏明确的办学定位,容易走上模仿“双一流”高校“求大求全”、热衷于办研究型高校的歧途。由于它们普遍缺乏相应的基础和条件,模仿必造成劳民伤财的后果。而将其改造成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既可在自己的特色优势领域独树一帜,又可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应用型高校具有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的较好基础和较大潜力。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已有民办高校799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5.6%,



其中民办普通本科学校 414 所，占到普通本科高校的 31.7%，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已有一定基础。与研究型高校相比，应用型高校与市场联系更紧密，更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办学，能吸引企业家办学，未来的潜力很大。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应用型高校就是由企业家捐资创立的。华为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共建通信工程(华为实验班)，培养通信技术应用人才。腾讯与深圳大学合办人工智能(腾班)，培养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阿里巴巴与浙江万里学院共建“阿里云大数据应用学院”，培养大数据应用型人才。随着产教融合机制的完善，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应用型高校建设。

三、相关政策建议

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尽快制定具体落实指导意见，进一

步明确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方向 and 办法。修改和完善 1986 年由国务院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明确应用型高校的設置条件和程序。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应用型高校办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应用型高校校园建设、专业建设、课堂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质量标准。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应用型高校特点的教育评价体系，将技术研发和转化成果数、技术服务收入占比、双师型教师比例、毕业生就业率、专业与区域产业适配度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将“双非”高校、地方本科高校作为建设各具特色应用型高校的重点。针对 1257 所普通本科



高校中除去147所“双一流”高校后的“双非”高校，除了少数具有升级为研究型潜力的高校外，都可将其逐步改造成为各具特色的应用型高校。鉴于“双非”高校多为地方本科高校，依据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继续推进。在尽快摸清这些高校底数的基础上，精选一批高校进行应用型高校改造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可参照研究型高校“双一流”和技能型院校“双高”（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由国家和有条件的省份推出应用型高校和专业建设“双一流”或“双高”计划的专项政策和支持项目。

引导应用型高校朝特色化方向发展。按照《纲要》提出的“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要求，鼓励应用型高校结合自身特色优势，

明确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方式、产教融合等方面的独特定位。支持和引导地方应用型高校围绕本地特色优势，开设一批与本地发展匹配度高的区域特色专业；实施“省级特色学科群培育计划”，鼓励地方应用型高校围绕本地产业集群组建特色学科群；建立“区域产业适配度”学科专业评估标准，围绕区域重点产业链开展特色学科专业评估。修改完善教育部等5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针对应用型高校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运用大数据监测区域产业链人才需求，压缩连续两年就业率和就业对口率均较低专业的招生指标，开通“紧缺特需专业”备案绿色通道。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特色应用型高校办学。鼓励社会资本创办应用型高校，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特色班级和产教融合平台，实行订单式培



养, 要求企业承担不少于 30% 的实践教学任务, 有关投入可享受企业职工培训费用、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收抵扣政策。支持应用型高校相对集中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及省级层面组建应用型高校联盟和产教融合共同体, 推动应用型高校资源共享、基地共建、教师互聘、课程共建、学生交流、学分互认等, 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加强特色应用型高校的师资建设和生源保障。实施“双师型师资振兴计划”。每年选派 1 万名应用型高校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将企业实践经历作为应用型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 要求应用型专业教师每 5 年累计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6 个月。设立“产业教授”特聘岗位, 开通产业系列职称评聘渠道, 重点考查论文等研究成果是否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探索实施分类招生制度, 允许在统一高考基础上根

据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的不同特点和需求, 实行不同的考试科目组合、加试内容、最低分标准、综合素养评价等, 保证各类高校公平获得优质生源。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炳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2026 年 3 月 30 日
《中国经济时报》)



应用型本科高校：过去十年发展简述及未来十年发展策略

序：一般而言，在国际上，应用型高校发展的黄金时期是 20 世纪后半期。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发展应用型高校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被二战破坏的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和经济的恢复建设，各种经济和民生设施建设需要源源不断的各类建设人才；二是二战结束以后，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孵化了众多新兴产业，社会生产能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应用型人才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这就为应用型高校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奠定了最牢固的社会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德国、瑞士、芬兰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大力推动应用型高校发展，形成以突出应用型教学和科研、建设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应用型师资、为企业培养优质实务人才

为特征的“欧洲模式”。与学术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目标不同，“双一流”高校面向国际，在国际范围与世界知名大学较短长，一流应用型高校面向地方，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地方企业发展面临的技术问题，为当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一流应用型高校不以解决学术前沿问题为目标，而是以如何学习好“欧洲模式”，将新科技、新技术运用于现实生产中并加以改进，其人才培养目标重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非学术能力培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三大类型之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术技能型



高校形成错位发展，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入普及化进程的生力军。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403所新建本科院校基本都选择了“应用型”发展定位。

一、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十年（2015-2025）

近十年来，中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从“转型探索”到“内涵建强”的深刻变革。



（一）国家政策层面：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有战略部署，但尚缺失系统性制度设计

2014-2015年 (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启动转型。 明确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向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2017年 (《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	明确应用型本科高校 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并列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
2017年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深化融合。 将产教融合从教育改革措施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推动高校与产业对接。
2019年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体系构建。 将应用型高校建设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推动“一大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2021年 (“十四五”规划)	战略推进。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顶层设计中再次强调“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2024年 (政府工作报告)	目标升级。 首次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标志着工作重点从“转型”迈向“强起来”。



(二) 典型省份实践层面:
有不同侧重的政策,但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广东省:为加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打造应用型重点学科,安排了包含7所高校的专项建设资金超过80亿元。

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分类发展,突出应用、聚焦应用,遴选了20所高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示范校进行重点建设。

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本科院校建设标准(试行)》,对立项建设的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均给予1000万元支持,2017年又对两所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每年奖补经费3000万元。

河南省:示范引领,分阶段推进。河南省早在2013年和2014年便确定了两批15所本科转型

发展试点学校。2015年,又启动了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建设计划,先后确定10所示范校并投入专项资金4.7亿元予以重点支持。2021年,河南进一步扩充遴选示范校,计划将示范校数量扩充至15所左右,作为“十四五”时期重点建设的转型发展标杆高校。

山西省:标准引领,分批次推进。山西省教育厅于2021年出台《关于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并配套制定了《山西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标准(试行)》,计划分三批(2021-2023年)遴选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在支持举措上,山西优先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申报国家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在省级一流专业、课程立项中给予倾斜。

江苏省:2021年3月出台《省教育厅关于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施意见》,率先启



动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计划、本科类产业教授选聘工作等配套专项计划,并于 2024 年遴选首批 6 所高校作为江苏省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点,每年给予各校财政专项经费 2000 万元。

福建省:福建省于 2015 年启动转型试点,确定了 18 所整体转型高校及一批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群,明确了“先建后选”的原则。在试点基础上,2018 年遴选了福建工程学院、厦门理工学院、武夷学院、泉州师范学院、莆田学院、福建江夏学院、三明学院、龙岩学院、闽江学院等 9 所高校为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及 35 个示范性应用型专业群等重点项目,通过树立标杆引领全省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各地方的做法差异性较大。江苏省将“硕士学位”作为一流应用型大学遴选的门槛条件;山东省重点在非博士、硕士高校中推进应用型本

科高校建设,鼓励和支持博士、硕士高校整校建设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或将部分专业建设为应用型本科专业;安徽省、福建省、浙江省均未将“硕士学位”作为应用型本科示范高校遴选的条件,特别是浙江省遴选的应用型建设试点高校中还有 4 所独立学院;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遴选的 7 所高校,既有“双一流”高校,也有东莞理工学院等应用型本科高校。从这些省份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相关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来看,近十年中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之路,是一条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从宏观转型到微观改革的系统工程。其核心逻辑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更加侧重于内涵提升与特色打造,尤其在数字化转型、绿色技能培养、应对新



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面，应用型本科高校将被期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为支撑区域产业发展和新技术创新策源地的重要力量。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存在的共性发展难题

应用型本科高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普及化的主要任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但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发展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办学定位不准确。不少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定位上存在模糊性，未能清晰界定自身的发展方向 and 特色，它们在办学过程中按照惯有思维、囿于传统价值判断而片面追求学术型的办学标准，放弃了应用型高校本应具有的特质和差异性。

2、人才培养质量落后于时代需求。人才培养目标导向不清晰，课程体系设置“长于”传统学科

知识体系，既未触及行业前沿，又缺乏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的仪器设备的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先天性落后”，导致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技能难以适应行业企业的人才要求。

3、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主要来源于研究型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教师准入政策和管理制度主要强调学术研究能力，轻于对专业实践能力的考查，教师培训和发展体系不完善，缺乏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双能型教师，师资队伍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缓慢。

4、同质化竞争趋势加剧。应用型本科高校之间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高校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和学科的建设，忽视了区域特色和自身优势的发挥。同质化竞争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培养的低效。

5、教育评价体系不科学。我国高校评价体系过于注重学理性



的纵向科研课题和学术论文，讲究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排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不适用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把尺”的困境，难以获得社会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6、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是生均拨款、学费和住宿费。在与同地区研究型大学“争”经费时，由于“一把尺”的评价体系，它们难以从政府获得专项财政支持，绝大部分高校仅可基本维持“生存”，难以谋求“发展”；更或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这势必影响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所以，有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另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相对而言，应用型本科高校

在目前高等教育体系制度设计特别是政策支持体系中存在较严重的缺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未来十年发展策略

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关于“应用型本科高校”，有如下三点描述：

（十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



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十二)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发展。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支持部省合建高校加快发展,优化省部共建高校区域布局。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二十一)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加强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衔接培养。加强教考衔接,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

站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基础上,

面向未来,应用型本科高校确实需要一套清晰的融合政策导向、国情趋势和高校实践的综合性发展框架,将更加聚焦于内涵提升、特色打造和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增强。

精准定位与战略导航

未来十年,应用型高校必须放弃“大而全”的幻想,转而追求“小而精、特而美”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精准定位与错位发展: 高校需深刻理解所在区域的核心产业布局与未来产业蓝图。例如,四川计划建设的应用型品牌高校,就紧密围绕其“六大优势产业”展开。民办高校尤其要勇于“错位发展”,避开传统学术型高校的赛道,聚焦于培养特定领域的“高能向产”型人才。建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行业企业贡献度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机制。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未来高校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响应速度与决策效率。应用型高校应建立由政府、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制度，以确保办学方向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同时，借鉴青岛恒星科技学院的“校企孪生”治理模式，通过产权的紧密连接，构建“育人优先、成本补偿、价值共创”的治理体系，能从根本上保障产教融合的深度与稳定性。

重塑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是应用型高校的根基，其改革与创新是立足未来的重中之重。

优化专业布局，动态响应需求：高校必须建立“调停转增”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这意味着要果断缩减甚至淘汰滞后专业，积极增设如工业智能、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兴专业，并推动传统专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深化产教融合，从“物理撮合”到“化学融合”：

共建实体：与龙头企业共建

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学院等实体机构，将企业真实的生产线、研发项目引入校园。

创新教学模式：推广“科社”制（科技社群），让学生在“企业真实场景”和“真实项目”中，实现“学间工、工间学”的沉浸式学习。同时，构建“一轴两轮、三类三能、四融合”等协同育人模式，精准对接社会对研究应用型、创新应用型、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多元需求。

强化数字素养，拥抱智能时代：将人工智能素养培养置于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开设《人工智能应用导论》等通识课程，更要全面启动专业课程的 AI 融合升级计划，推动每个专业至少有一门核心课程完成智能化改造，培养学生利用 AI 工具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夯实师资与资源保障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这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命脉所在。高校需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大力引进企业专家，另一方面实现青年教师专业实践的全覆盖，并通过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持续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

构建“价值共创”的产教融合生态：产教融合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所有参与方都能实现价值增值。高校可以借鉴“价值共创理论”，积极寻找与整合校企双方的互补优势，追求“1+1>2”的合作溢出效应，最终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维价值的最大化。

拓展国际化资源，培养全球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应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等模式，融合中西教育优势，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能力的全球化人才。

构建持续改进的质量品牌

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民办高校尤其要构建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校、院、专业、

课程四级质量保证体系。这并非为了应付评估，而是为了驱动校内各个层面进行持续性的自我改进。

培育特色，以“特”立“强”：未来十年是应用型高校品牌竞争的十年。必须牢固树立“特色即质量、优势、水平、核心竞争力”的观念。你的价值，在于你无法被轻易替代的独特性。

总结与展望

未来十年，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竞争格局将日趋明朗，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从“转型”到“建强”：政策导向从初期的推动转型，转向现在的“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更注重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从“示范”到“品牌”：多地规划建设应用型品牌高校、品牌专业，标志着发展重点从扩大试点转向培育特色、打造标杆。

差异化与分类发展：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必须走差异化的特



色发展之路。高校需要重新考虑自身的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等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问题。

(文章有删减)。

(来源: 2025 年 10 月 7 日

首席管理官)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创新

黄荣杰 魏涛 刘芳宇

摘要: 地方应用型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 科技成果转化是其实现使命、优化人才培养、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然而, 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着制度性障碍、资源性短板和创新生态制约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赋权机制突破、评价体系重构和校企协同深化等路径, 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提升转化效能, 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区域创新生态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分类改革; 地方应用型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其中, 应用型高校被赋予了聚焦“技术迭代”与“产业服务”的核心使命。在此

背景下, 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地方的主力军, 其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能, 直接关系到核心使命的达成度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效果。然而, 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仍面临着“不想转、不敢转、缺钱转”等诸多困境。因此, 地方应用型高校需立足其“应用型”定位与“地方性”特征, 深度融入区域产业生态,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使其科研成果能够更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迫切性

科技成果转化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打通“教育—科技—人才”



循环的关键枢纽，只有通过高效务实的科技成果转化，地方应用型高校才能切实将科技势能转化为服务区域发展的现实动能，以产教融合重塑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以技术落地突破发展瓶颈，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路径。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核心在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将知识创新转化为解决地方产业痛点、驱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履行这一核心使命的直接途径和必然要求，只有将实验室的成果有效转移到产业一线，才能真正实现高校对地方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价值贡献。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普遍面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困境，造成巨大的智力与公共财政资源浪费。这种低效状态与国家投入期待、地方产业对技术的迫切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亟需通过创新转化机

制破解资源闲置问题，兑现服务承诺。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涵盖技术开发、中试及产业化等关键环节，包含丰富的教学案例和实践平台。将真实的研发与转化过程融入教学，是锻造符合市场需求、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毕业生的关键途径，也是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人才培养特色的重要体现。地方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对技术创新需求空前迫切。企业在面对技术瓶颈、寻求智能化改造、开发新产品时，急需高校提供可落地的技术解决方案、工艺改进方案和高素质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技术源和人才库，如果不能快速响应并提供有效的科技供给，将错失服务地方、提升自身价值的关键窗口期，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升级受阻或转向外部寻求支持。

面对资源约束和激烈竞争，



地方应用型高校需要突破对传统财政拨款的过度依赖。科技成果转化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学校社会声誉和影响力,这不仅拓宽了办学经费来源,更能增强学校在招生、人才引进、争取项目等方面的竞争力,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类院校在技术转移机制创新、产学研融合深度、服务地方贡献度等方面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呈现“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已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赢得发展先机、避免被边缘化、吸引优质生源与师资的紧迫生存发展课题。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现实困境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多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制度、资源、生态层面,亟待系统性破解。

1. 制度性障碍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制度性障碍集中体现在权属争议与评价错位两大层面。

一方面,职务科技成果因其国有资产属性受到严格管控,形成转化流程的制度性障碍。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导致转化过程需履行多重审批、评估及备案程序,显著延长转化周期并增加操作成本。更为关键的是,成果转化中的价格波动风险易被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迫使管理人员采取保守策略。另一方面,现有职称评价机制与成果转化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量化评价指标过度偏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等传统科研产出,这类成果普遍占据核心权重,而成果转化实际贡献仅作为边缘性参考指标。这种价值导向导致科研人员优先追求易量化的学术成果,降低对技术市场化可行性的关注,催生大量缺乏转化潜力的研究产出。同



时，从事中试开发、工艺优化等转化关键环节的科研人员，因评价体系未认可其工作价值，在职业发展中处于系统性劣势，进一步削弱科研主体参与转化的内生动力。

2. 资源性短板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资源性短板构成了显著的现实困境，集中体现在资金缺口与服务断层两大核心层面，制约着实验室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资金缺口问题表现为横向结余经费的闲置与转化链条的断裂。高校教师通过承担企业横向项目积累的经费结余，本应是支持成果迈向市场的宝贵“自有”资源。然而，一些高校僵化的预算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限制了其使用灵活性，结余资金往往被要求返还或上缴，难以投入到中试放大、工艺优化、样机迭代、市场验证等风险高、投入大的关键环节。

同时，缺乏鼓励将横向结余跨项目、跨年度用于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清晰政策导向，导致大量流动资金被冻结。这种“有钱不能用”或“有钱不敢用”的窘境，造成了转化链条上关键的资金断点，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因缺乏过渡性资金而止步于实验室阶段。然而，仅仅解决资金问题并不足够，成果转化还需要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现有工作多由科研管理人员兼任，其精力与专业能力结构难以支撑起成果价值深度评估、知识产权精准布局、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商业计划制订、投融资引入以及复杂商务谈判等核心转化服务。这种专业队伍的缺位，使得大量成果因缺乏专业化的市场导入而未能实际应用。这两大短板共同作用，不仅造成了宝贵创新资源的浪费，更在深层次上阻碍了高校创新活力向区域经济动能转化的效率提升。

3. 创新生态制约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仅受限于制度障碍和内部资源短板，更深受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其中，校企协同深度不足与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适配性滞后，构成阻碍成果高效转化的深层生态瓶颈。

第一，校企协同弱化，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脱节。地方应用型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关系存在“形联实疏”的困境。一方面，高校科研活动仍以学术导向为主，教师考核侧重论文、纵向课题与专利数量，导致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技术成熟度低，难以匹配企业迫切的产业化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因短期成本压力和风险规避，对参与前瞻性技术合作意愿薄弱，多倾向于委托高校解决低层次、碎片化的技术问题，比如检测分析、设备维修，而非共同投入中长期关键技术研发。这种脱节状态，使得双方无

法形成需求共研、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深度协同机制，导致科研成果与产业应用之间出现转化断层。第二，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结构匹配不足。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布局仍延续传统工科框架（如机械、化工、纺织等），未能及时响应区域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对复合型、交叉型人才的需求。这种错配带来双重制约，不仅使科研方向偏离产业新赛道，高校积累的技术成果与地方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需求脱钩，而且还造成人才培养供给侧失效，毕业生技能结构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进一步削弱了校企协同的人才纽带。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驱动下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困境，地方应用型高校需借助分类改革，系统性创新转化路径。赋权机制突破，以职务成果所有权赋予与



长期使用权试点双轨并行，激发科研人员“主动转”意愿，破解“不敢转”难题；评价体系重构，建立转化导向的职称晋升序列与绩效激励机制，扭转“唯论文”倾向，驱动创新向市场聚焦；校企协同深化则依托全链条服务平台、“订单式”研发及动态学科调整，增强成果转化效能，推动形成多方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1. 赋权机制突破，激活应用型地方高校成果转化的内驱力

地方应用型高校长期受困于科研人员“不敢转”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权属模糊与激励缺位的制度壁垒。近年来，以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为核心、长期使用权试点为补充的双轨机制创新，通过重构成果产权配置规则，正系统性扭转转化逻辑，驱动主体从“不敢转”到“主动转”。以“三权分置”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核心突破。在权属层面，试点高校通过“先确权后转

化”模式，将成果部分或全部所有权直接赋予发明人团队，使其获得法定转化主导权；在收益与经费层面，明确发明人团队享有合适的转化收益，实现从“象征性奖励”到“实质性产权收益”的跨越。在横向科研经费管理上，采取“负面清单与正向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并将结余经费全部留归项目团队自主分配或出资成果转化，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在风险层面，建立“勤勉尽责免责”机制，对合规转化中的决策风险予以包容。这一改革将科研人员从技术生产者升格为转化决策者，通过产权赋能彻底激活其主动对接市场、推动成果落地的内驱力。长期使用权试点则是从资源管理与利用的角度出发，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创新环境。试点赋予科研团队或个人在一定期限内对特定科研设施、设备、数据等资源的长期使用权，使其能



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内进行深度研发和成果转化探索。这种做法避免了因使用权频繁变动而导致的科研工作中断或资源浪费问题，使科研人员可以更有规划地投入长期项目研究，如一些基础性、前沿性的科研课题，以及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到成效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科研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基础，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持续产出与转化。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与长期使用权试点，共同构成破解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化困局的制度性杠杆，不仅化解了“不敢转”的核心阻碍，更推动高校从“行政管控”转向“服务赋能”，为区域产业创新注入可持续的科技成果供给动能。未来需进一步细化权属登记、作价评估、纠纷解决等配套规则，使赋权机制真正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2. 评价体系重构，重塑地方

应用型高校成果转化的价值导向

分类改革背景下，构建以职称评审制度重塑为核心、绩效激励机制优化为支撑的评价体系，通过将转化成效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从根本上扭转科研行为的评判标准，驱动科研人员更多地投入到能解决产业难题、满足市场需求、带来实际效益的研发活动中去。

传统职称评审往往过于注重论文发表数量、科研项目级别等指标，忽视了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实际贡献，影响了教师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设立成果转化型职称序列，突出技术转移转化业绩权重，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标准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探索以市场化方式引进聘用一批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将其纳入工程序列职称评审范围。对专职从事技术转移研究、运营、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工程系列单独设置技术经理人



专业，单独开展职称评审，重点评价其在推广科技成果取得经济社会效益过程中所作贡献。另一方面，职称改革破除职业发展壁垒后，需同步解决日常绩效激励问题。第一，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激励力度，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按一定比例直接分配给科研人员或团队，使其能够切实享受到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经济回报；第二，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奖励基金，对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科研人员给予额外的奖励；第三，推行分阶段里程碑奖励机制，按技术合同签订、中试验证、产品上市、规模产业化等关键节点分期兑付奖励，破解长周期转化中的激励耗散。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贡献，及时调整其绩效激励水平，确保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职称评审改革和绩效激励机制优化，共同构建“转化即价值、贡献即回报”的生态系统，将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成果转化动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未来需着力完善转化效益动态监测工具与市场端评价反馈机制，使评价体系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核心驱动引擎。

3. 校企协同深化，构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共生系统

地方应用型高校传统校企合作多停留于技术咨询、设备共享等“单点对接”层面，难以支撑系统性成果转化。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驱动下，平台载体全链条服务赋能、订单式研发需求精准匹配、学科结构动态适配产业升级的三维协同创新，正推动校企关系从碎片化协作向深度融合的生态共同体质变。

构建功能集成的平台载体是支撑生态共建的基础设施。各省市需积极打造或升级集技术孵化、



中试验证、成果评价、市场对接、金融支持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致力于提供覆盖创新链全流程的“全链条服务”。这类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连接高校和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堵点，有效弥合了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转化断层，显著缩短了科技成果从概念验证到市场落地的转化周期，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持续协同奠定了基础。

推行需求导向的“订单式”研发模式是激活生态共建的核心引擎。该模式突破传统“先研发、再找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变为由企业根据实际生产瓶颈和市场需求直接“出题”，高校科研团队据此进行精准“解题”和定向攻关。这种以企业需求为起点的研发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科研立项的针对性与成果的市场适配性，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有效性和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使校企合作

更加紧密且目标明确，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

加快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是保障生态共建长效运行的战略支点。地方应用型高校紧密对接所在区域的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未来产业布局，主动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着力构建“优势学科+高度匹配地方特色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通过培育与发展地方急需的优势特色学科群，比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校不仅能为订单式研发提供稳定、高质量且高度契合的智力与人才供给，更能从源头上确保科研方向、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长期同频共振。

通过打造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平台载体、推行以需求为牵引的“订单式”研发，以及实施匹配地方产业的学科结构调整这三大核心举措，地方应用型高校正系统性地构建起一个以共生共赢



为目标的校企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这一从孤立“单点”到有机“生态”的深刻转变，不仅有效激活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与效率，显著提升了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贡献度，更成为彰显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成效的生动实践，最终推动形成高校、企业、地方多方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略。

[本文为 2024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2024SJGLX0019）、2024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24SJGLX0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黄荣杰为郑州轻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

（来源：2025 年第 19 期《中国高等教育》）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苏州工学院院长 姜建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三大类型之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术技能型高校形成错位发展，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入普及化进程的生力军。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量大面广”的显著特征。在数量上，截至2024年底，我国1308所本科高校中464所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如果将博士点作为研究型高校分类的一个“门槛”，则剩余的844所高校绝大部分都可划分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广度上，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

来，全国403所新建本科院校基本都选择了“应用型”发展定位。应用型本科高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普及化的主要任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但它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共性发展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办学定位不准确。不少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定位上存在模糊性，未能清晰界定自身的发展方向 and 特色，它们在办学过程中按照惯有思维、囿于传统价值判断而片面追求学术型的办学标准，放弃了应用型高校本应具有的特质和差异性。

人才培养质量落后于时代需求。人才培养目标导向不清晰，课程体系设置“长于”传统学科知识体系，既未触及行业前沿，又缺乏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的仪器设备的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先天性落后”，导致学生的知识储



备和技术技能难以适应行业企业的人才要求。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主要来源于研究型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教师准入政策和管理制度主要强调学术研究能力，轻于对专业实践能力的考查，教师培训和发展体系不完善，缺乏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双能型教师，师资队伍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缓慢。

同质化竞争趋势加剧。应用型本科高校之间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高校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和学科的建设，忽视了区域特色和自身优势的发挥。同质化竞争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培养的低效。

教育评价体系不科学。我国高校评价体系过于注重学理性的纵向科研课题和学术论文，讲究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排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不适用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

“一把尺”的困境，难以获得社会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是生均拨款、学费和住宿费。在与同地区研究型大学“争”经费时，由于“一把尺”的评价体系，它们难以从政府获得专项财政支持，绝大部分高校仅可基本维持“生存”，难以谋求“发展”；更或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这势必影响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制约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原因剖析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另一方面，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相对而言，应用型本科高校在目前高等教育体系制度设计特别是政策支持体系中存在较严重的缺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国家层面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政策引导不充分

2015年，国家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极大推进了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2019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引导高职高专院校“双高”建设取得积极的进展。

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于2015年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但政策落实不充分，例如“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等要求，至今仍未落地。教育部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的“分类指导”要求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应用型本科建设，但是审核评估总体上属于导向性和建议性评价，与办学资源配置没有直接挂钩，还不足以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提供坚定的政策保障和改革方向。应该说，在国家层面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缺失系统性制度设计。

(二) 国家层面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专项财政支持有限

按照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由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绝大部分是地方院校，其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支持，而国家层面则是通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经费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过去的10年间，一些应用型本科高校还通过竞争性申报获得了国家“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的支持。总体来说，中央财政对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费支持还是有限的，远不能满足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发展需求。随着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投入增长远跟不上规模扩张。在地方财政支持能力不足、自身筹措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资金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三) 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依然普遍存在。近年来,我国民众虽然已经逐渐从“注重学历”转向“注重能力”,但由于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就业薪酬的较大差异,大多数民众依然认为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就业岗位要“低人一等”。与德国“双元制”教育被社会普遍认可相比,我国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低,导致部分家长及学生仍要追求学历提升,努力成为“研究型”人才,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当下,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注重的是对学理

性、学科性内容的考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设置。

另外,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大型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时,常常存在不合理的、歧视性的要求,如将毕业学校设置为应聘“门槛”,从而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生直接被排除在外。这不仅违背了人才招聘公平的原则,限制了人才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低认同度。

(四) 社会企业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支持度不高

注重实践教学和产学研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重要且必要的育人途径。产教融合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学(协)会等多元主体,作为产教融合主要主体的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经济来源不同,目标指向和利益点各有侧重,很难基于共同利益建立长效



机制。特别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捆绑”机制，企业花费很大力气参与培养的优秀人才经常不能为自己所用，长此以往，企业就逐渐丧失了与学校合作的兴趣。反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在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企业文化影响下，几乎所有优秀的大型企业都参与了为全社会而非单为本企业培养人才的过程。

（五）应用型本科高校自身发展路径不清晰

应用型本科高校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尚“无法”摆脱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依赖”。以“学院”冠名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无一例外会提出“申硕”“升大”“申博”等新目标，但按照现行制度，这些新发展目标的内涵要素仍是传统高水平大学评价体系中的标准、条件。这样的评价指挥棒直接影响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关注点，从而偏离了国家对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战略期待和发展要求。

（六）应用型本科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缺乏创新

应用型本科高校过于依赖传统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没有根据学校的学科特色、专业优势和所在区域的社会需求，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领域，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战略，难以及时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界需求匹配程度不高，在进行专业调整时往往瞻前顾后，出于担心教师分流、教师转型等可能引起社会舆情等原因而犹豫不决，增设新专业易、改造淘汰老专业难，专业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少产业界急需的交叉学科专业，往往出现企业需要的新兴专业高校没有，高校现有的传统专业企业又看不上，校企双方推动产教融合时难以找到共同的“关切点”。



三、我国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实践探索

2015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 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应用型本科高校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并列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以及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此外,教育部先后于 2021 年、2023 年组织遴选了两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应该说,国家正逐步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制度安排。

在这期间,很多省份也认识到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截至 2024 年底,全国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政策文件。广东省为加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打造应用型重点学科,安排了包含 7 所高校的专项建设资金超过 80 亿元;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分类发展,突出应用、聚焦应用,遴选了 20 所高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示范校进行重点建设;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本科院校建设标准(试行)》,对立项建设的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均给予 1000 万元支持,2017 年又对两所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每年奖补经费 3000 万元;2020 年、2021 年,山东省分两批遴选确定 36 所省属本科高校为支持单位,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江苏省于 2021 年 3 月出台《省教育厅关于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



设的实施意见》，率先启动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计划、本科类产业教授选聘工作等配套专项计划，并于 2024 年遴选首批 6 所高校作为江苏省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点，每年给予各校财政专项经费 2000 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各地方的做法差异性较大。江苏省将“硕士学位”作为一流应用型大学遴选的门槛条件；山东省重点在非博士、硕士高校中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鼓励和支持博士、硕士高校整校建设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或将部分专业建设为应用型本科专业；安徽省、浙江省均未将“硕士学位”作为应用型本科示范高校遴选的条件，特别是浙江省遴选的应用型建设试点高校中还有 4 所独立学院；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遴选的 7 所高校，既有“双一流”高校，也有东莞理工学院等应用型本科高校。从这些省份的政策和实践可以看

出，相关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

四、进一步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政策建议

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现实诉求，也是建设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必然需要，更是高标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命题。要在认真总结相关省（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出台实施国家层面的一揽子计划，建立健全“分类发展”下的“分赛道”政策支持保障体系，以打造“双一流”计划、“双高”计划同样的决心和手笔，加快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一是及时改革完善高等学校设置的相关规定。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我国高校绝大部分是以“学院”进行命名，只有少量是以“大学”命名的。1986 年，国务院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2006 年，教育部发布



《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从学科覆盖面、办学规模、研究生教育、教师队伍、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对以“大学”命名的高校提出要求。应该说，这两个文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上述规定带来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一是为了满足学科覆盖面的要求，以“学院”命名的高校在更名“大学”过程中，往往发展一些“花钱”不多但社会需求少的人文社科学科专业，萎缩掉一些“烧钱”多但社会需求大的理工学科专业，同时也造成了“千校一面”现象。这也是师范学院在更名为“师范大学”以后几乎都成了综合型大学的最主要原因。二是一些学科特色明显、办学水平很高但学科专业单一的高校，例如高水平的艺术、音乐学院等始终无法更名为“大学”。三是这一制度在设计之初就人为地设定了“大学”比

“学院”层次高，导致“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不顾自身的特点将更名“大学”作为终极目标。同时，也给社会民众造成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社会认可度。纵观世界高等教育，一些以“学院”命名的高校，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无疑是全球顶级高校。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作出了新的探索，近几年新设立的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在设立之初就是以“大学”命名的。

二是在全社会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营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规定公立单位在新员工招聘中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将高校分为“三六九等”，确保所有类型的本科高校毕业生都能平等地参与竞争。用人单位应转变用人观念，注重毕业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而非仅仅看重其毕业院校的背景。



应用型本科高校也应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办学理念和成果，展示其毕业生的优秀表现，提高社会和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其毕业生的认可度。消除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歧视”，建立平等的用人环境，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三是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具备的条件和要素、承担的任务、发展的路径；同时，对现行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进行改革，按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特点平行制定一套新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包括申报条件及评审程序）。在此基础上，给予应用型本科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新建本科高校选择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并按照新的研究生学位点建设体系发展研究生教育。

当然，也要允许选择应用型发展路径的一些本科高校在发展

过程中根据区域需要、自身发展状况，重新选择按照研究型高校的发展路径，教育主管部门则按照相关条件重新进行评估。

四是在国家层面实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计划。出台《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标准》，在当下的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本科高校中重点打造一批应用研究能力强、产业发展贡献度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完善中央财政支持及配套政策，引导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争先进位。“十五五”期间，在全国遴选 150 所左右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一流建设单位试点。今后，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指导性意见实践经验基础上，可以逐步扩展到新体系下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通过实施该计划，不仅可以提升社会民众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认同度，而且会大大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水平。

五是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协



同共建机制。加快推进部省共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先锋区建设。积极探索共建机制建设,支持工业基础好、教育实力强、有改革意愿的省、设区市,以市域、县域为单位建设产教城融合发展示范区,鼓励建立“政府+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大学+产业园区+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产教融合各方主体凝聚在一起,从政策层面激发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内驱动力,将产教融合效果纳入对地方政府、高校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年度高质量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推动落实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优惠政策,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企业优先享有税收减免优惠、财政补助、土地使用费用优惠、人才倾斜等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协同育人环境,加快构建产教城、科教才互动发展新格局。

六是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对接

平台。加强国家、省级层面统筹,围绕地方政府、产业园区、高校、行业企业等主体,建设产教融合信息对接平台,发挥平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定期发布高校学生实习、教师企业研修、科技成果转化等信息,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需求、员工招聘等信息,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配套政策,使得企业和高校能自觉、及时了解双方的“供需”情况,推动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人才选拔方式从“选育用”向“育用选”转变,逐步构建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企业为支点、高校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打造支撑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七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应用型人才社会认同度。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从机制上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超越仅仅为自己培养人才的局限,积极参与为社会育人的全过程,将



人才培养视为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通过提供实习实训平台、开展校企合作项目等方式，为更多有志于成为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学生提供成长机会。此外，目前存在的社会工种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更制约了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国家层面应统筹提升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收入水平，让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既是对他们个人价值的认可，也是尊重劳动、尊重技能的体现。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技能学习和实践，推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八是多措并举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评价方式过于侧重论文和成果的考核，忽视实践能力的评价，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悖，需要从

根源上解决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来源单一和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积极探索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的教师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此外，人社部门、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配套和落实，指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引进来自企业一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师资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企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项目、实习实训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样肩负着在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进程中，须以国家战略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分类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环境；以专项计划为牵引，强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政策协同为保障，激发政府、高校、



企业、社会联动效能，提升师资实践赋能。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造一批应用型标杆高校和水平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形成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的高等教育新生态，为国家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人才根基。

(来源：2025 年 7 月 4 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应用型高校要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加快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备受各方关注。各地高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日前，2025年应用型人才模式改革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的200余位代表，共同探讨AI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转型之路。

近年来，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在加速完善，产教融合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适配。不久前，上海5所市属高校启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目的就是引导高校密切跟踪市场需求，与行业产业共同制定学科专业建设规划，促进培养体系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逻辑”转变、培养方式从“标准化培养”向“定制化培养”转变。一些地方高校也快速响应，

积极探索校企双元育人模式，重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重塑人才培养体系、重构考核评价机制，追求产教适配、精准培养已蔚然成风。

但也要看到，产教适配机制不完善、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脱节依然是瓶颈、顽疾。如何进一步完善产教适配机制，精准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广大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必答题。审视当下，产教错配问题困扰着部分高校的人才高质量培养。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培养目标未能精准锚定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升级，导致“学非所用”；培养过程未能有效对接行业标准和岗位能力要求，教学与生产脱节；评价体系未能有效引导师生面向应用、服务产业；校企合作未能建立互利共赢长效机制，多停留浅层，校热企冷。上述问题的本质是供给导向办学逻辑与需



求驱动市场规律的割裂。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完善产教适配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系统转型。只有政校企等多方协同发力、系统推进，共建适配闭环，才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完善的产教适配机制是在区域层面构建以产业需求为逻辑起点、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协同创新为动力、以制度政策为保障的闭环运行体系。其核心是通过政校企等多元主体协作和动态调整机制，解决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高校要主动变，要看市场“吃饭”，教真本事。高校办学要“贴地飞行”，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学科专业设置要紧跟地方产业升级。课程内容要“保鲜”，要把企业真实项目、最新技术标准及时变成课堂内容，多开实践课、项目课，多让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要懂行，学校既要鼓

励教师去企业“充电”，也要把企业专家请进校园讲课。

要提振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参与有“甜头”，企业才能真投入。企业出人、出力、出地方帮学校培养学生，政府要给补偿，比如减税、发补贴、提供用地，或者报销一部分成本，别让企业白干。可以给予企业一定“优先权”。深度合作的企业，可以优先挑选好学生去实习，毕业时优先录用优秀人才，甚至可以和学校一起搞研发、优先用成果。这样，企业才觉得投入值得，能招到合心意的好苗子。学校开设什么专业，学生实习实训要掌握哪些技能、怎么教、怎么考，要充分听取企业的建议。这样，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人才确实符合岗位要求。

长效保障机制对于完善产教适配机制至关重要。政府搭好台，合作才长久。政府要出台清晰的政策或法规，明确学校和企业合



作时的职责、权限。政府可牵头建设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大数据平台,定期公布急需学科专业目录。高校在招生、培养前就知道市场缺什么人、缺多少人,确保培养方向目标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定期“体检”看效果,可请第三方专家或机构定期检查校企合作到底有没有用、培养的人才企业满不满意、对地方产业的贡献度有多大。同时,要奖励干得好的。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重点奖励那些合作效果好、培养人才质量高的校企组合,或者有创新、可持续的好项目,形成“干得好就支持多”的正向循环。

完善产教适配机制,构建政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地方高校才能源源不断地产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作者:张平,系邵阳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来源:2025 年 7 月 17 日
《中国教育报》第 02 版)

崇德啟智

勵志博學

